

分析与探讨

早期东南亚华人资本： 历史机遇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

施雪琴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该地区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探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学术界在探讨“东亚模式”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华侨华人在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东南亚是华侨华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人数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80%以上。数百年前，来自中国华南沿海的数百万华人移民，历尽艰辛，至今天逐渐发展成为所在国经济乃至地区性和全球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成为商业、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诸多经济领域的佼佼者，为东南亚各国民族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来，东南亚华人经济在加深当地化的同时，朝着经营多样化、投资全球化的趋势发展，形成了众多在国家与地区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华人财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海外华人经济交往的密切和加深，华人经济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而与此课题密切相关的话题是华人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华人资本是如何形成的？长期以来，国外一些学者宣扬“华人是外来剥削者、东方犹太人”，“华侨经济是殖民主义经济的残余形态”等观点，成为东南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反华、排华的理论依据。为了弄清楚东南亚华人经济的性质，必须探讨东南亚华人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只有如此，才能消除流传在理论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观点。本文拟从华人在东南亚的历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来探讨早期东南亚华人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时间起止是从西方殖民者东来到十九世纪末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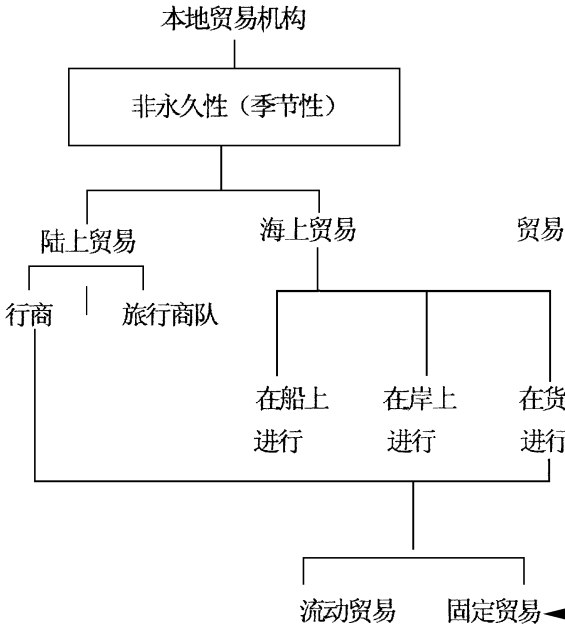
—

在探讨东南亚华人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时，学者们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殖民地时期东南亚社会特殊的经济结构中，华人起着“中间阶层”即“中介”的作用。“华侨在殖民时代的作用，在于沟通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欧国家与被统治的原著民之间的联系。西欧殖民国家寻求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掠取亚洲各地的资源，但是，先进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却很难和尚未摆脱原始社会状态的殖民地经济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他们便利用了华侨作为这两者的粘合剂，并视之为宝贝，……”。^①华侨在殖民地经济结构中处于“中介”地位，这种观点现在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在此笔者认同这种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殖民者东来以前华人经济的状况以及后来华人“中介”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因篇幅所限，仅对荷属东印度的华人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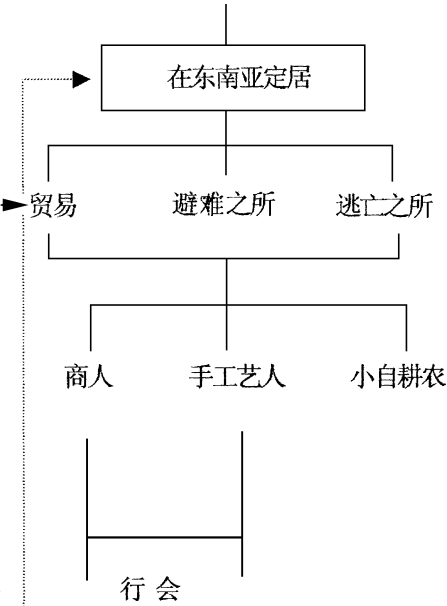
从历史来看，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前，华人已在东南亚各地从事贸易、生产活动。华人移民东南亚各地的原因，首推贸易的发展。唐宋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黄金时期，所以因贸易而前往海外的人也渐渐增多。早期的帆船动力依靠季风，为等待季风，

所以逐渐有商人在当地居住下来，开始时多是季节性的暂住，后来由于贸易的发展，需要大量收购当地货物，需要在当地建立存放货物的仓库，需要有人看管仓库，所以需要人长期住在当地，于是出现了长期住在当地的华商。朱彥在《萍洲可谈》卷二中记述“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番”，并提到有的华商“住番十年不归”，说明华商已开始从“行商”向“住商”过渡。东南亚华人经济活动的演变可以下表表述：^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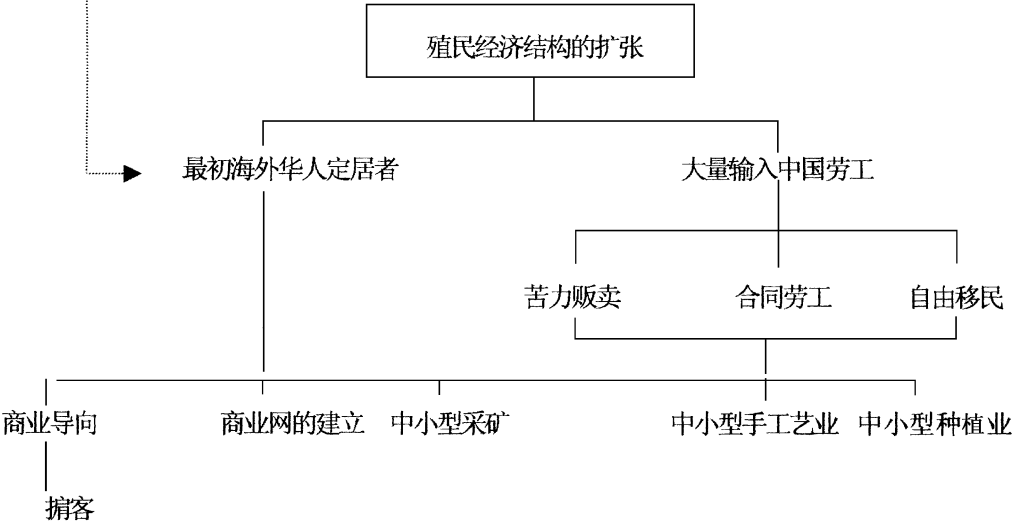
1. 十六世纪以前



2. 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叶
最初的贸易模式



3. 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唐宋时代, 尽管海外贸易十分繁荣, 发展至东洋、南洋以及阿拉伯世界, 也出现了许多华商定居的贸易地, 但是华人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十分有限, 无论是活动地域的范围, 还是经济活动的领域, 都相当狭小。入明以后, 海外移民才成为初具规模的社会现象。移民地域亦已广布于南洋各地。明前期的海外移民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南洋群岛和印支半岛地区, 以至形成了由华人移民组成的“新村”。如在爪哇岛的杜板、新村、苏鲁巴益和满都伯夷,^③ 苏门答腊岛的旧港、三佛齐、爪哇的万丹、北加浪岸、杜并都有不少来自闽粤沿海的华人移民在此聚居生活。^④ 华人不仅从事商业, 而且从事生产性的开发活动, 如经营农业、种植胡椒、生产砂糖和从事酿酒业。外国史籍也称赞华侨为“最能干的耕耘者”。^⑤ 许多华人还与当地妇女通婚, 信仰当地的宗教, 在当地繁衍生息, 这说明华人亦已开始定居并同化于当地。如在婆罗洲(加里曼丹)明初即有华番杂居现象, 郑和下西洋曾经此地区, 其后移民者日众; 南婆罗洲的文朗马神与明朝朝贡贸易关系甚密, 华夷通婚, 华商不思归唐, 不少定居于此。^⑥ 所以说早在殖民者东来之前华人已在南洋各地从事和平的贸易和生产活动。这在西人的记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1596年当荷兰人第一次到达爪哇时, 他们在繁荣的贸易中心万丹港便注意到了中国人的勤劳情形; 这次航行的指挥官霍特曼记述说: “万丹的中国人村庄有着很美丽的住宅, 村落用结实的栅栏围起来”, 他还指出, 中国人多是商人, 但也有些中国人是种胡椒和水稻的农民, 还有些中国人挑着担子、带着秤杆深入到内地去收购胡椒, 并指出万丹的繁荣是靠这些中国人造成的。^⑦ 可见在殖民者东来以前, 华人亦已在东南亚从事商业和其他生产活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前, 华人在东南亚各地的经济活动是地区性的。西方殖民者的东来打断了东南亚各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 开始把东南亚各国、同时也把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纳入了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由西方国家支配的世界体系。^{*}

二

谈到世界体系, 就不能不谈到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来的。世界体系理论的特点在于用体系的观点来审视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发展与变化。它是在“依附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又不象依附论那样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和边陲两个部分, 从二者的关系来分析发达与不发达, 而是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分析总体的发展规律, 并从总体发展过程中窥视作为部分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象。”^⑧ 沃勒斯坦认为, 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 但这些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 而是互相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 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沃氏将世界体系的起点一直追溯到1500年前后的西北欧, 他从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拓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扩张性。他认为自十六世纪以来,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逐渐扩张, 开始形成了以“西北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

* 用整体观来研究地区和世界历史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历史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和新方法。其特点是把世界历史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研究, 而不是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全国、各地区历史的总和。其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及其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及其著作《现代世界体系》, 美国历史学家C.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及其著作《全球通史》——笔者注。

体系”。这个“世界性经济体系”是一个整体结构，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组成。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专业分工：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包括用于铸币和饰物的贵金属）和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除了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外，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介于两者之间。三种角色缺一不可，否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不能存在。沃勒斯坦还认为，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和地区，都要受到世界体系发展的制约，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呈现出特定的发展形态以适应世界体系的需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⑨“世界体系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450—1640年间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开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经济征服逐渐代替了军事征服和政治独裁，殖民主义的本质不在于“殖民”，而在于创建一个有利于西方支配非西方社会的中心——边陲依赖格局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构。”^⑩现在我们来考察十六世纪以后，伴随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印尼社会是如何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在此过程中，华人充当了何种角色，华人资本又是如何积累和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前提是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化，而商品化对于非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是非西方社会被联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的主要途径。^⑪人类学者认为，可从四个方面考察非西方社会商品化的途径：（1）劳动力流动和商品化；（2）非农商业生产的出现；（3）商品粮的生产；（4）工商文化的引进。考察东南亚的华侨史，从中可以发现在东南亚社会通过商品化途径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华侨劳动力因其廉价和高效而成为贸易、农业、采矿业以及手工业等行业的主体，华侨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即东南亚地区充当了特殊的中介。

首先，在印尼社会沦为殖民地过程中，在其商品化的过程中，华侨成为当地劳动力流动和商品化的主体。1596年荷兰人侵占万丹后，为加快对东印度群岛的掠夺，1602年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是一个集殖民统治、军事侵略、商业掠夺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机构。该公司成立后，它驱逐了在锡兰、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的葡萄牙势力，并继续向东扩张。1619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达维亚设立总督府。荷兰殖民者为了开发巴达维亚，亟需大量劳力。1596年荷兰人第一次到达万丹时已经注意到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所以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后就制定了一项利用中国人来作为他们经营殖民地的劳动力的方针。一方面，公司用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华侨。如第一任总督燕·彼得逊·昆不仅用高额工资招引万丹的华侨，而且对移居巴达维亚的华商课以轻税，并给以行动自由，并奖励华侨招引他们的同乡来巴达维亚。同时公司又用暴力手段来掳掠华人。除到中国沿海掳掠当地人民到巴达维亚充当契约劳工以外，又以扣留华侨船只等手段，迫使万丹等地的华侨移居巴达维亚。结果巴达维亚的华侨迅速增加，1619年，巴达维亚有华侨300—400人，1629年则增至2000人。^⑫

吸引华人开发东印度群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长期政策。1623年昆总督在给他的继任者卡本第尔的训令中这样写到：“要紧的是要增加巴达维亚、马鲁古群岛、安汶、斑达群岛的人口。……而且象中国人这样对我们有用的种族在世界上是找不到有第二个的。但是要同中国人做交易却决不是和平手段能达到目的的，要利用季风派遣船队到中国

沿岸, 尽量掠夺更多的男、女和儿童, …… 中国人的身价一人可达 60 里尔, 必须千方百计不让中国妇女回到或迁到公司管辖区以外的地区, 必须靠这些妇女来增殖殖民地的中国人。”^⑩ 所以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吸引人口政策, 再加上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 特别是华南沿海的人多地狭、土地高度集中、政局变动和战乱等因素,^⑪ 使得东印度群岛的华侨人口得以迅速增长, 1720 年巴达维亚城内已有华侨 6 万人, 城外则有 4 万人。^⑫ 到 1733 年, 城内有华侨 8 万人, 而且日益成为发展当地经济的主力。鸦片战争后, 中国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瓦解, 沿海人民更是以涌潮之势奔向海外。

第二, 华侨是荷属东印度非农商业生产和商品粮生产的主要生产者。由于历史的原因, 早在荷兰殖民者东来以前, 华侨就已在东印度群岛的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等地区从事贸易、手工业和种植业。荷兰人东来后, 为利用华侨的才能开发东印度群岛, 对华侨实行了某些比较特殊的政策。比如在早期, 巴达维亚华侨和其他居民一样, 负有协助建筑巴达维亚城寨和堞壕的任务。但到了 1620 年, 由于每月缴纳人头税, 华侨的这一市民义务就大部分豁免了。因为华侨“比起筑城的工程劳动, 华侨更善于经营商业、农业、渔业、烧碳业、缝纫以及其他生产劳动。”^⑬ 为利用华侨的商业网络, 殖民当局把零售商业留给华侨, 而由东印度公司经营大商业批发, 市民 (指荷兰居民) 则从事中介商的业务。但后来华侨的零售商业欣欣向荣, 甚至侵入了荷兰人中介商的业务范围。^⑭

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 华侨主要作为开发当地资源的劳动力和小商贩而从事各类经济活动。东印度西加里曼丹岛的金矿开采、邦加、勿里洞的锡矿开采、巴达维亚制糖业的发展以及胡椒业种植业、烟草业、橡胶业和木材开发包含了多少华侨工人的血汗! 西方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动力是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的第一阶段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原始资本积累的特征是通过非雇佣劳动来获得剩余价值。荷兰殖民者在东印度群岛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是“税收承包制”。因为此制度隐藏了雇佣关系, 所以历来被西方学者夸大为华侨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 华侨被认为是荷兰殖民者的助手, 是承包制的“垄断者”和最大受益者。不可否认, 极少数华侨首领通过“税收承包制”积累了资本, 但华侨资本的主要来源还是其它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况且, 承包税收未必一定发财。^⑮ 正如日本南洋协会的《南洋华侨》一书所论述的那样: “(荷印) 华侨的生计有三分之一是靠商业, 五分之一从事工业, 余者从事农业或充当种植园的苦力。荷印华侨经济的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商业方面, 他们在中介商和小商贩方面牢牢地确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 而且对世界市场有着重大影响。”

第三, 华侨在给当地土著带去工商观念和事业概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印尼社会的商品化是荷人东来以后才开始的。在荷兰殖民者东来之前, 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岛屿由于地处海上交通要塞, 盛产香料, 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地区。在西人东来之前, 阿拉伯人、印度人、华人都在该地区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相比, 华人不仅在沿海交通便捷、土地肥沃的地方从事贸易和生产, 而且能深入穷乡僻壤收购土产、销售货物, 在不毛之地开荒种地。荷人东来后, 注意到华侨的勤劳和才能, 特别是华侨的工商观念和经商才能, 符合荷兰殖民者开发殖民地的需求, 所以华侨被赋予某种权利, 如经营零售业、免除某些劳役以及上文提到的“税收承包制”等等。

三

但是上面的叙述似乎只解释了为什么华人能被西方殖民者选中作为中介商人, 现在的问

题是为什么要选择某些人作为中介商人。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么简单：“先进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却很难以和尚未摆脱原始社会状态的殖民地经济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他们便利用了华侨作为这两者的粘合剂，并视之为宝贝，……”^⑩其实还存在更深层次、更根本的原因。“早期资本主义在外围地区的扩张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中心开发外围地区的资源而使前者受益，后者受损；另一方面，中心在侵入外围的过程中，有可能打破后者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成长。”^⑪众所周知，早期资本主义在外围的扩张并不是要发展外围地区的资本主义，更不是要在外围地区培植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荷属东印度，荷兰人于1641年就在该地区建立了垄断贸易。其后他们对该群岛的产品买卖实行买主独家垄断制，至十八世纪，荷兰人建立了一套强迫交货、强迫种植，甚至作为法律义务规定农民土地上必须种植特定商业性作物的制度。专业化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荷属东印度公司来决定。“富饶的岛国变成了广阔的荷兰种植园，或者，从人民的观点来看，变成了强制劳动营。”^⑫“受到危害的部门不仅仅是农业部门。荷兰人有计划地阻碍农业以外的当地企业的发展，甚至把中国人带进来在各行各业里充当中间商。爪哇本地的商业和工业活动完全被摧毁。”^⑬相反，“殖民地官员们却加强了某些影响大的传统阶级——例如土地寡头——的权力，以便进行统治。而外国资本家们则由于当地政府态度友好以及他们本身拥有大量财富和丰富经验而得到好处，他们不允许当地出现竞争者”。^⑭“落后地区发展起来的那些工商业都被迅速地纳入了垄断集团——寡头统治者的富豪伙伴——的控制之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而且有效地堵塞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⑮在这种情况下，“寄生的地主和商人阶级要比那些有可能成为强有力的生产性企业家的人物更受欢迎……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利用——在许多情况下帮助建立——以奴隶制、债务农奴制、契约劳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非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劳动制度”。^⑯由此可见，华人中介者的地位、华人资本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于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殖民地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荷兰殖民者东来后，打断了印尼历史、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也扰乱了华侨资本积累的自然进程，在印尼社会被荷兰殖民者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华侨由于自身的特点，更由于资本主义在外围地区扩张的性质，而在此体系中充当了中介者和廉价劳动力，在商业、采矿业、种植业等行业中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结束语

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探讨华人经济发展动力的时候，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华人共同的中华文化背景，即以儒教伦理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于是乎“儒教资本主义”似乎成为华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些学者在探讨华人资本发展的原因时，把华人资本的性质定性为“仿资本主义”或称“密友”资本主义。^⑰用儒家文化来诠释华人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对德国学者韦伯“中国儒教伦理不利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理论的反驳，但此方法却又承接了韦伯用文化来诠释经济的观点，甚至比韦伯更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文化论者从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所谓儒教伦理中找到了韦伯的新教伦理的功能性等价物（instrumental equivalents），他们强调华人伦理精神，如勤劳、节俭、家族主义、文化亲和力等是海外华人节俭发展的原动力，即传统的儒教价值观促进了海外华人企业的发展和投资的扩张。”^⑱其实在西方学术界，对韦伯的关于新教伦理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论也仍有异议。况

且,韦伯虽然特别强调包括宗教伦理在内的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但他并非纯粹的文化论者。毕竟,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归结于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和宗教思想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不仅仅是宗教伦理等文化因素的作用。所以,“通过强调伦理差别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差异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方法论的误区。”^⑩同样,对华人资本主义冠之以“密友”资本主义,笔者认为是以偏概全。他们认为,东南亚大部分企业家是“仿资本家”,而不是产业资本家。“仿资本家”基本上支持统治精英的垄断者、租金追求者和投机者。^⑪不可否认,东南亚各国存在着所谓的“仿资本家”,特别是在印尼,当代某些华人企业家与印尼的军政要员勾结以求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东南亚有上千万华人,又有为数众多的华人企业家,他们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有自身的企业经营特点,所以单以此就给华人资本冠之以“仿资本主义”难免有偏激之嫌。而且这种观点忽视了华人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本质特征,夸大了某些华人资本积累和扩张时的阴暗面,这种论点同“华侨经济是殖民主义经济的残余形态”、“华人是外来剥削者、东方犹太人”、“华侨执东南亚经济之牛耳”等观点一样,成为东南亚某些国家和地区反华排华的依据之一。所以,弄清楚华人资本形成的原因和历史,对纠正学术界的某些谬误、理解华人资本的性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上只是一家之言,恳请大方之家指正。

(作者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注释:

① ⑩日本广播协会丛书《华侨》(1974年修订版),第150-151页。转引自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② [英] S. B. Redding《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和风格》,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6页。

③ 马欢:《瀛涯胜览·爪哇条》;张燮:《东西洋考》卷3。

④ 明史卷325,外国传六。

⑤ 马斯登:《苏门答腊史》。转引自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⑥ 张燮:《东西洋考》卷4。

⑦ Cornelis de Houtman《荷兰人的第一次航行》。引文见岩生成一:《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考》,见《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3期。

⑧ 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⑨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⑩ ⑪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1页。

⑫ 胡廷:《苏鸣岗》,第348-349页。转引自《南洋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第84页。

⑬ H. P. 麦克勒尔:《海外华人》,转引自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第161页。

⑭ 参看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第228-236页。

⑮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年出版,第34页。关于此时巴达维亚华侨人数有不同的数据,一说1725年巴城华侨只有一万人,参阅竹内熏雄《印尼华侨发展史概况》,载《南洋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第84页。

⑯ 《东印度公司决议录》第一卷,第76页。转引自《南洋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第84页。

⑰ 竹内熏雄:《印尼华侨发展史概况》,载《南洋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第83页。

⑱ 蔡仁龙:《荷属东印度时期的承包制和华侨》,《南洋问题》1983年第3期。

- ②③⑤ 托马斯·E·韦斯科夫:《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载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191-187页。
- ②④ M·考德威尔:《印度尼西亚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转引自基恩·格里芬:《从历史上看不发达问题》,载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 ② 保罗·巴兰:《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载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1页。
- ② 陈国贵:《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神话与误解》,见陈文寿主编《华侨华人的经济透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 ②③ 陈文寿:《韦伯新教资本主义模式与海外华人经济的文化诠释》,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20页。
- ② 持这种观点之一的是由吉原久仁夫的著作《东南亚仿资本主义的兴起》,引自陈国贵上揭文。

。 书讯一。

《东南亚手册》出版

赵和曼主编、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东南亚手册》,已于2000年5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这是一部全面了解东南亚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的综合性工具书。全书由“十国简况”与“资料选编”两大部分组成,前有“总论”,后有“后记”。“十国简况”分国别编写,每国纲目均分为地理(概述、资源、省市、人口)、历史(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政治(概述、政府、国会、政党、团体)、外交(概述、与中国的关系、与其它主要国家的关系)、经济(概述、发展阶段、经济成就、主要措施、存在问题)、军事(概述、机构、三军现状)、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习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主要节日)等八大项;“资料选编”包括“东南亚各国统计资料”、“东南亚各国历任党政军领导人名单”、“东南亚各国著名人物简介”、“东南亚国家大事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大事记”、“东南亚各国人名译名表”、“东南亚各国地名译名表”、“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简况”、“东南亚商机无限”等九种。

该书有五大特色:一是材料新。书中所述多以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的材料为主,一直写到2000年4月。如在“东南亚商机无限”篇中,作者援引今年初以来媒体有关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报道,论述了中国西部大开发给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带来的机遇。二是知识性与学术性兼而有之。本书所反映出的各国国情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体现出撰稿人的看法或倾向。三是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如经济部分运用综述的方法平铺直叙,不兜圈子,使人一目了然。四是详略得当,有所侧重。如该书所述重点经济部分,占了“十国简况”中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分概述、发展阶段、经济成就、主要措施、存在问题等五项进行综述,轮廓分明,条理清楚,便于了解。五是附有大量注解(页注),材料来源清楚,便于核对或引用。总之,该手册将十国国情与重要资料编成一书,内容丰富,材料新鲜,论述详实,简明扼要,查阅方便,不失为近年来同类工具书中的上乘之作。

(晓迪)